

明水文史資料

明水文史資料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明水县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

1980·明水

内 部 发 行

明水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明水县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出版

明水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字数60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黑新出图(89)303号 工本费：0.90元

目 录

解放前明水的中医中药	张宏吉	(1)
我在明水女校读书的那些年	张玉英	(5)
旨在愚民的祭孔孟祭关岳	于景荣	(9)
我当印刷工人四十年	王恒忠	(12)
我县杂货铺的兴衰	赵荣第	(17)
残酷的日伪法西斯教育	吕斯塞	(21)
记施爱棠老师的一件事	赖振洲	(29)
维持会受的一场虚惊	张宏吉	(31)
回忆光复后明水县的剿匪斗争	崔荣泰	(34)
明水县新华胰蜡厂	李东阳	(50)
忆明水大众文化社	孙志堂	(53)
明水县新华纺织厂	李东阳	(58)
我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秧歌	郑洪亮、于景荣	(62)
二人转在我县	郑洪亮、于景荣	(70)
我在古城	耿存志	(88)
我县农村第一个供销社	佟玉金	(99)
通泉火灾回忆	张文良	(103)
记著名作家林青	于文士	(105)

解放前明水的中医中药

张 宏 吉

民国时期，我县的医药事业十分落后，西医极少，中医也不过200人左右。到了1927年（民国十六年），县城内也只有7家药铺，中医不过10人（不包括私医）。

伪满后期，百业凋零，中小商号纷纷倒闭，大商号也奄奄一息，唯独中医、中药行业，却出现了“虚胖”现象。医药牌照、膏药幌子之多，形成了压倒一切之势。请看下表：

伪满后期明水县城中医中药业分布表

地 址	字号名称	医 生	备 注
东街路北	大 益 成	耿 蓝 亭	
"	广 祜 诊所	周 日 新	解放后任县卫协常委、第一届县政协委员、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	远 东 药 房	尹 凤 楼	
"	宪 亚 诊 所	郭 宪 亚	
"	天 福 堂	邢 永 富	
"	锦 和 盛		

地 址	字号名称	医 生	备 注
东街路北	德源兴		
"	玉书诊所	亢 玉书	
北街路东	德生益	赵 春芳	
北街路西	益兴昌	隋 子清	
西街路北	延生堂	裴 俊峰	
"	德盛祥		
"	广增和		
"	田春堂	田 德民	
"	德庆和	陈 世杰	
"	德丰厚	杨 德志	
"	青兴厚	王 立德	儿科名医 解放后任第一、 至第五届县政 协委员
"	作新诊所	石 作新	
"	福民堂	郭 玉山	解放后任第二、 三、四届县政协 委员
西街路南	德玉堂	张 维东	
"	子和诊所	宋 子和	
"	宪章药房	王 宪章	
"	洪钧药房	刘 洪钧	
"	宝生堂	胡 振河	
"	同春堂	李 秀山	
"	作山诊所	李 作山	
"	蒋老道膏药店	蒋 老道	蒋姓，老道是绰号

地 址	字号名称	医 生	备 注
东街路北	昆玉诊所	徐 昆 徐 化	玉 民
"	协昌水	张 济	舟
南街路东	耀廷诊所	甘 耀	廷
"	戒三诊所	王 戒	三
"	方舟诊所	邢 方	舟
"	德庆兴	肖 子	峰
"	子彬诊所	肖 子	彬

卖药的、从医的何以如此之多？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种：

1、当时日伪为了挽救战争败局，加紧了掠夺，使得劳动人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在严重的缺乏营养与恶劣的卫生环境下，患病率极高，要求医药业发展。

2、自从日伪实行“七·二五停止令”（1942年7月25日，日伪当局发布命令：一切商品实行定量配给、限价出售）之后，除了几家大商号尚能苟延残喘之外，其它行业都先后关板停业，失业人数增加，迫使一些人改行换业。又由于中药材尚不是日寇的急需军用物资，中药业和其它行业比较起来，尚有点生机，因而也吸引一部分失业者从药就医。

3、当时的失业者被称为“浮浪”。如果能得到一个由伪保健股签发的“汉医证”，就可免去劳工。这样，有些失业者千方百计地托人情、送礼物、行贿赂，弄个“汉医证”，挤到医药行业里来谋生。

4、改行从医者，不需要很多资本，只要找个师傅或自

学汤头、药性、脉诀等简单常识，就可维持生活。

当时中药业的类型大致有两种：

1、以卖药为主，不设座堂医生，中草药为主销货，兼售中成药，还有少量的西药。其特点是资金较雄厚，货物齐全，上至牛黄、麝香、犀角、羚羊，下至甘草、艾蒿、车前子、益母膏，应有尽有。还能按配方自制丸、散、膏、丹。

2、行医带卖药，有的有字号，有的叫诊所。人员少，有的只医生一人，有的带一个徒弟，没有超过三人的；药物不全，只有常用药，一旦缺货时，随时到第一类药房买进。

中矿业的类型有以下几种：

1、科班出身。自幼学医，或出生于医生世家继承祖业，有较深的医学造诣，诊断准确率较高，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这类医生的代表人物有：

张济舟、周日新、耿荟亭、郭玉山、杨德孚、石作新等。

2、半路出家。由于某种原因改行学医，还有的住药铺多年，明白药性，先是自己有病自己医，后来试探着给别人开方，逐步正式行医。半路出家的医生中，也有功成名就的，也有平平庸庸的。象陈世杰、隋子清，就很受患者信赖。

3、有祖传秘方，或掌握一些民间验方，专治一两种疑难病症。如：疗毒恶疮、内外痔瘘、花柳梅毒、包忌大烟，等等。

4、卖方不卖药。他们没有门面，不挂牌匾，有的有“汉医证”，有的是无证的私医，姓氏名谁，数字多少，无法查考。

我在明水女校读书的那些年

张玉英

明水女校什么时候成立，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我上学之前就听说，女校的老师们挨家逐户动员女孩子上学。有些家长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很深，把女孩子藏起来，谎称家中没有女孩，等老师走后，再把女孩放出来。我很幸运，我的父亲念过书，很开明。在我11岁那年（1928年）父亲就叫我上女校读书了。

女校地址在“西关家”（当初县城内有两家关姓大院相邻，故有东西关家之称。在县电影院西侧）。临街的五间正房是教室；东厢房五间，其中两间半是教室，另两间半是老师宿舍、食堂、办公室。

学生人数最多不过百人，一至六年级都有。老师不过五六人。我所记忆中的老师有：

王俊然，女，校长兼音体课，拜泉师范毕业；

宋风义，女，王俊然走后任校长，拜泉师范毕业；

宋风书，女，拜泉师范毕业，后任校长；

邢淑云，女，语文教师，拜泉师范毕业；

徐俊卿，女，记不清她的学历，我毕业时她任校长。

这些女老师都是大姑娘，年龄在20岁左右。看上去都端庄文静，但在课堂上却十分严肃。学生对她们是又敬又怕。

当时使用的文具都很简单。多数学生用一块小包皮包上小石板、石笔和课本，用手拎着上学，很少有背书包的。到了三四年级才使用铅笔，五六年级使用蘸水钢笔或毛笔。

课程设置：一二年级开语文、算术，三四年级增开三民主义，五六年级增开历史、地理、英语。

课堂常规和现在差不多，老师的教学方法比较简单，多是照本宣科。讲语文与现在不大相同。开始上课时，学生把书本合上，放在桌子上，身子坐直。老师讲课文大意、中心内容，然后依次叫学生复述课文大意，接着叫学生打开书本念书。都会念了，这课书就算讲完。

老师讲课时注重联系时事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当时正是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候，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咄咄逼人。历史教师在讲《岳飞》一课时，超出教材范围，讲了岳母刺字、昏君误国、奸相陷害忠良等；讲到《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时，详细讲述了北洋军阀政府为了扩充实力，借助外国扶持，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把主权出卖给日本。语文老师那淑云讲《堤坝》一课时，把日本帝国主义比做洪水，把堤坝比做国防。她说，一个国家没有巩固的国防，就会受到外国的侵略。要使国防巩固，必须富国强兵；要富国强兵，必须唤起民众。她要求我们好好学习，将来为救国救民出力。她们的讲课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恨不得一下子长大，报效国家。有一回那老师给我们讲了安重根刺杀伊藤

博文的故事，听后顿觉人心大快。

当然老师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其中也不乏不学无术之人。有一回，一位男老师给我们讲课，讲到拿破仑时，他说：拿破仑英勇善战，力大无穷，同敌人作战时，他拿两个破车轮子当武器，就把敌人打跑了，所以人们就叫他拿破仑。他刚讲完，就惹得哄堂大笑。事后，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校方把他辞退了。

在女校读书时，最使人头痛的就是“背书”。老师讲一课背一课，讲到哪里就得背到哪里，讲完一册就得背通本。

背书开始了，老师一手拿书，一手执教鞭。学生面向老师，有时也面向同学。老师提个头，学生开始背。背到中间，老师突然叫停，又从另一课书中提到一句，学生就得接着这一句往下背。若不是把全本书都背得滚瓜烂熟，很难应付老师的考验。如果谁不会背或背得结结巴巴，老师就用教鞭在她的前胸或后背“捅”一下，做为惩罚，随之训斥几句或者叫她下次再背。

学生的社会活动不多。每年春季组织一次野游，春秋两季上丁之日举行祭孔。一般没有其它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我正在学校读书。1932年10月，马占山的部队来到明水。他们开会、做讲演、撒传单，号召民众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女校师生大受鼓舞，手拿传单走上大街，深入小巷，挨门逐户进行宣传，唤起民众投入抗日高潮。至今，我还记得传单上的几句话：

“十八夜，南满站，日军向我放炮弹，大街小巷尸首遍……”

和我一起参加宣传的同学很多，如今我还记得两人：徐

王琴和李淑芝。

尽管我们协助马占山的部队作了一些宣传工作，民众也曾对他们寄予过希望，但终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汉奸的出卖，我们怀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愤懑心情，眼睁睁地看着地方当局的头面人物“欢迎”日本鬼子进城。这时，我已经离开女校，学了点文化也没有派到用场。

1945年8月光复后不久，共产党接收了明水，成立了城区政府，建立了街道组织。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又掀起了文化建设高潮。我被选为民师，教居民组的妇女学文化，还组织居民排演文艺节目，欢送新兵入伍，给军属拜年。真没想到，在旧社会念过几年书，识了几个字，到新社会还有了用。现在，每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就想起了我在女校读书时的日日夜夜。

（张宏大整理）

旨在愚民的祭孔孟祭关岳

于景荣

我国人民，历来尊孔子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称岳飞为民族英雄。他们受到人们的景仰与拥戴，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旧社会的历代统治阶级，一向将孔子、孟子奉为文圣，将关羽、岳飞尊为武圣，大肆加以吹捧，年年举行祭祀，搞得神乎其神。

据我所知，伪满洲国的“时宪书”（俗称“皇历”）中，将祭孔孟、祭关岳列为重要纪念节日。每年春夏之交祭祀武圣——关壮缪王、岳武穆王，孟秋之际祭祀文圣——至圣先师孔子、亚圣贤师孟子。其声势之大，举动之盛，均不亚于当时至高无上的“万寿节”。

早年间，我县设有关帝庙，俗称武庙，座落于县城南门外公路西侧（今亚麻厂一带）。庙内设关羽和岳飞之巨型塑像。虽无文庙，但于武庙内设有文圣祠堂。内供孔孟二圣之巨幅画像。一年一度的祭孔孟、祭关岳之举，均在此进行。

为迎接祭孔孟、祭关岳，政府于临期前，下令大搞环境卫生，整顿街容市貌。不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检查，如遇

“不轨”之情，轻则加以训斥，重则处以罚款。

是日清晨，政府首脑及文武官员、军警士吏，全着节日盛装。文官着梅和礼服，军警全副武装，学生穿统一校服。各界打国旗，学校打校旗；列长队、奏鼓乐，同道而往，蔚以宣扬祭祀活动之声势。

庙堂内由僧侣提前彻底清扫，礼仪厅由主管部门派专人进行装饰，提前将关岳雕像粉饰一新或将孔孟画像重新更换。

祭祀礼仪设主祭官、陪祭官和侍从官员。祭文圣时，主祭官由县长担任，陪祭官由行政科长担任，侍从官员由文教股长和属官担任；祭武圣时，主祭官由副县长担任，陪祭官由国民高等学校教育（军界）和警务科长兼任，侍从官员由警界股长级人员担任。

凡参加祭礼之各界人员，均须提前半小时到场。由侍从官员和司仪人主持进行“演演”，以防临时出现漏洞。如：奏乐、唱歌和行礼等环节，反复练习多次，直到满意方休。对礼貌尤为严格。如：始终脱帽敬立，保持庄重肃静，不准中间出入，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咳嗽吐痰，等等。

礼仪厅祭坛前，设一大型供案。案上铺以黄缎围布，上摆满祭祀供品，如：白条全猪、全羊，各色鲜果，大碗白米饭、雪花馒头。还有古朴高雅的壶、杯、碟、筷和香炉、鼎台，等等。在主像前设香案，上放香炉，炉内生香。庙堂内烟雾缭绕。

祭礼开始前，由主持人调查到场人数，提示与会须知。相继礼仪正式开始。由司仪人按礼序掌握进行。

礼序内容概为：宣布礼仪开始（放鞭炮、奏雅乐）；唱祭歌（指定某校学生预先练熟）；主祭官、陪祭官斋戒、沐

浴（漱口、洗手）；主、陪祭官即位（面对圣像肃立）；献香、献酒、献白（“白”，即水煮猪羊肉方），均由侍从官员传递给主陪祭官后，按司仪人一献、再献、三献的口号进行；行冥拜礼（主陪祭官随司仪人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的口号跪拜叩头，其余人同时行所谓“最敬礼”的九十度三鞠躬）；最后敬诵祭文（祭文由，山县长宣读；祭武圣，山国高学校教育代读。祭文简介圣贤生平，赞颂圣贤丰功伟绩，祈求圣贤恩典与保佑）。

在献香、献酒、献白和行礼时，均山乐队奏雅乐。曲牌多为“祭腔”、“永乐吟”、“太子引香”、“八仙庆寿”等。

祭礼结束后，各机关、团体和学校均放假一天。

显而易见，统治阶级所以那样祭典，实质是借水行舟。其用心在于：借古代名人之“神威”，蒙蔽、愚弄广大小人民，以企人们对统治者俯仰由之，顺其摆布；从而达到他们永远奴役人民之罪恶目的。

我当印刷工人四十年

王 恒 忠

1938年，我19岁，为了谋生，经亲友介绍，到明水县广增和当学徒。

广增和是以药店为主，兼营书籍、文具、印刷的一个企业。经理看我年轻力壮，就把我派到印刷厂当徒工。

印刷厂是个三间土平房，东头开门。正冲着门的北面是一铺火炕，靠两边是字架。字架东边一米远的地方，摆放着一台铅印机。靠北墙放着两台石印机。南墙窗下有长长的案子，供写字、刻字、装订之用。

工人一共有7人。其中铅印2人，石印2人，刻字2人，写字1人。我是学铅印的，师傅叫马启龙。一般手艺人有个倔脾气，人们称之为“手艺棒子”。可马师傅却性情温和，对我关怀备至，和蔼耐心，从来没有训斥过我一句。在他的耐心教导下，不到半年时间，我就能独立工作了。

工厂生产以体力劳动为主。石印靠手摇，铅印靠脚蹬。马师傅的工作以排版为主，我以蹬机器、送纸为主。我的工作难度很大，既需要体力还需要耐力，头脑反映还要灵敏。蹬起机器来往往要连续几十分钟，甚至一二个小时，精神

稍有不集中，就会出现双张或歪斜。切纸也是我的份内之事。这既是个重体力劳动，又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切纸用的寸半木方约三尺长。先把它压在五百张白报纸上，左脚用力踩住，两手抓住菜刀似的切纸刀，用力向下划。如果脚踩不住或手劲不匀，不是把纸切成面条，就是将纸方子削出木屑。把一匹纸切成十六裁，没有不汗流浃背的。机器上没有活了，我就拣字、画字、装订。活计多了，前屋站柜台的伙计也都帮忙。至于校对、揽活、合价、收款、送货等，大多由前屋的管帐先生张克智担任。

厂里没有钟表，我们工人是黎明即起梳头漱洗，接着吃饭，饭后上班，从起床到吃完早饭大约一个小时。夏日天长，午睡约一小时，下午上工一直干到黄昏收工；冬季没有午睡，活多时还“打夜作”，资方供一顿夜餐。每天劳动时间在十二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十四五个小时以上，并没有什么加班费。

工人唯一的福利待遇就是吃饭不要钱。夏天一日三餐，冬天两顿饭，五天改善一次伙食（面食或大米），初一、十五吃包馅。春节放假六天，元宵、端午、仲秋各放假三天。此外，再没有假日。工人的工资有三种形式：刻字工人是计件工资，其他工人是月工资，我是年工资（每年100元伪币，外加20元辛苦钱）。我在广增和印刷局熬了八个春秋。由于我年轻力壮，苦熬苦受，又是技术骨干，经理对我很“重用”，有时也能满足我少量的提高工资的要求。

伪满后期，有梁氏三兄弟开办了一个“晨明远”印刷厂。老大性情憨厚，善于看门守户；老二连刻字带应酬生熟；老二懂技术、会管理，又长于社交，是个天才的“公共

关系”学家。几乎县城各机关、企业都成了他的关系单位。他能够利用竞争对手的精密设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广增和印刷局遇上了这样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又加上经理张子彬和兢兢业业的张克智相继过世，管理和外交人员后继无人，终于在竞争中败下阵来，于1945年末倒闭。工人们自找出路，我到崇德区民主乡种地务农。

震明远独家经营，生意更兴隆了。1949年旧历10月，梁经理捎信约我来震明远做工。我喜出望外，来到城里。张宏志对我说出了真情：原来震明远的机器需要检修。如果从外地雇技术工人检修，需要花大价钱。梁经理假意叫我做工，待机器修完后再行解雇。我见到了梁经理，探出了他的真实意图，如同张宏志说的一样，就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至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资方与工人的关系原来就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1950年1月，张宏吉托人带信把我找来。我们几个人合股开办了一个印刷厂，取名“工兴印刷厂”。厂址在原来广增和印刷局的前屋（现在的第一粮店）。人员有：陈钟洲（负责人）、王恒忠（铅印工）、于怀亭（铅印工）、姚金波（刻字工）、张宏志（刻字工）。

这个合资企业的从业人员，既是工人，又是股东。企业的命运和我们每个人都休戚相关。每个人都非常关心它的兴衰，起早贪黑，不辞辛苦，工厂办得腾腾火火。

1950年7月，县总工会吴崇宪主席把我找去，说工会要成立一个印刷厂，要求我去当技术骨干。当时我想，公家的企业有很多优越性。第一，不随意解雇工人；第二，不愁开不出工资；第三，生活有保障。因此，我欣然答应了。这